

姜景奎专栏

个人病痛与时代沉疴 —— 萨拉特笔下疾病缠身的印度

王春景

摘要：瘟疫影响了印度人民的生活，也在作家的创作中留下了印记。20世纪初的印度小说史上，萨拉特·钱德拉·查特吉是描写疾病与底层生活关系最多的作家。萨拉特在描摹贫民生活时经常会写到疾病。在他的作品中，疾病既是主题的构成要素，也是情节结构的发展动力。他描写了疾病与底层民众如影随形，本来属于生活非常态的疾病却成为常见的现象，凸显了疾病的日常化特征及疾病蕴含的等级内涵；疾病在他的作品中不仅仅是个体的身体和心理的经验，也是社会的痼疾，萨拉特描写了疾病对个体的影响及其在社会关系构建中所起的作用，把个体的病痛与社会批判有机结合起来，更客观而真实地剖开了印度传统社会的痼疾；萨拉特小说中的疾病书写在展示社会痼疾、突出底层痛苦的同时，否定了传统宗教救世的可能性，也描写了现代科学与印度民众之间巨大的鸿沟。小说中的主人公往往表现为“反英雄”的特点，他们脆弱不堪、犹疑不决、缺乏勇气、逃避生活，无力承担改变社会的使命。作家塑造的处于病状的主人公，反映了殖民主义时期失去主体地位的印度形象，从而批判了英国殖民统治对印度的剥夺和戕害。特定的被殖民的历史语境决定了印度疾病的无法治愈，主人公只能在病痛中等待新生的曙光。

关键词：萨拉特；印度文学；疾病叙事；小说研究；反英雄

收稿日期：2021-09-06

作者简介：王春景（1973~），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印度英语文学与中印文化关系。

20世纪初影响印度人民生活的重要事件，除了逐渐增强的民族主义思潮，就是几次大的饥荒和瘟疫，这在文学中也留下了较多的印记。在印度小说史上，描写人民遭受疾病折磨最多的作家应该是萨拉特·钱德拉·查特吉（Sarat Chandra

《南亚东南亚研究》2021年第5期，第111~124页。

Chattopadhyay, 1876~1938)。他与同时期的孟加拉小说家般吉姆·钱德拉·查特吉及泰戈尔相比，用了更多的笔墨描述底层人的病痛生活。与般吉姆和泰戈尔不同，他有长期流浪民间的经历，并且曾在当时英国的殖民地缅甸生活了十几年，拥有了审视印度的底层视角和异文化视角。其长篇小说《斯里甘特》^① (*Srikanta*) 以及诸多短篇小说，让读者看到了形形色色的印度底层人的生活。《斯里甘特》英译本前言中指出，萨拉特小说的价值在于，“它使国外读者更贴近印度生活，在这方面它胜过其他任何作品。”^②萨拉特在描摹贫民生活时经常会写到疾病。在他的作品中，疾病既是主题的构成要素，也具有结构性的功能。把疾病及其隐喻作为一个角度，可以有效地观察和剖析萨拉特的创作，理解他对殖民主义时期印度底层人的同情和对印度发展的忧虑。

一、疾病的日常化

就20世纪初的印度文学而言，或许没有哪个作家像萨拉特这样处处写到疾病，写到被疾病折磨的底层人。本来属于生活非常态的疾病却成为常见现象，在其小说中伴随着人物的活动自然而然地出现，凸显了印度底层人痛苦的生活状况。

萨拉特中短篇小说中的代表作都写到了底层人为疾病所苦的生活。《嫁不出去的女儿》(*Parineeta*, 1915年)中，孤苦无依的甘达与母亲去投奔舅舅，而舅舅所在的村庄是疟疾高发地，舅妈告诉她们疟疾比毒蛇还可怕，舅舅已患疟疾二十多天。没过几天，甘达开始发烧，这种不适一直伴随着她，直到小说结束。她的母亲一回到自己家也病倒了，而且病情不断加重，直至最后无法下床走动。《旱季的乡村》(*Mahesh*, 1922年)中，佃农高福出场时就在发烧，祭司问话时，他站在那里浑身发抖。短篇小说《奥帕吉的天空》(*Abhagi's Swarga*, 1926)中，穷苦孤单的奥帕吉被丈夫抛弃，与儿子相依为命，一天，她看到同村高种姓家庭的老妇人去世之后体面的火葬仪式，就开始念念不忘，渴望自己也可以有那样的葬礼。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她一病不起，直至死去。

在萨拉特的长篇小说代表作《斯里甘特》中，疾病出现得更加频繁。在主人公的成长过程和人物关系中，疾病及其伴随的死亡是经常出现的现象。儿时，斯里甘特和“自由的精灵”英迪拉夜间出门，“我们的船向前划了没多久，我便闻到一种说不出的恶臭气味，阵阵随风飘来。船越向前，臭味越大。这时，一阵

^① 这部作品有两个译本，石真译《斯里甘特》和刘运智译《甘特先生》，有关这部作品中的人名本文选用较为通用的石真译本。

^② Sarat chandra Chattopadhyay, K.C.Sen and Theodosia Thompson Trans.: *Srikant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2.p.ix.

疾风吹来，那臭气更加浓烈刺鼻。……‘是死尸。现在霍乱病正流行，死的人很多。不是全都有力量进行火葬；许多穷人只是在死尸嘴里点上一把火，把它扔给狗和豺狼，或者让它烂掉，臭味就是死尸发出来的。’”^①英迪拉的回答说明他已经对疾病中百姓大量死亡的现象习以为常。他们在河边看到一具儿童的尸体，英迪拉毫无惧色，抱起他放到水深的地方以免被豺狼吃掉。在斯里甘特的记忆中，幼时伙伴拉佳拉克什弥是一个病人的形象：“那时拉佳拉克什弥大约八九岁……肤色很白净，但是疟疾和脾脏肿大病折磨得她肚子大得像个竹篓，身体瘦弱，四肢如同干柴棍儿一般细；像铜丝一样焦黄的头发，稀稀疏疏，仿佛能够数得出共有几根。”^②斯里甘特几次陷入病痛之中，他也目睹了鼠疫、疟疾、霍乱这些传染病在民众中流行，不断有人死去。在去缅甸的船上，他看到去那里讨生活的穷人如何因为疾病被同船的人们侧目，到缅甸后被隔离，得了鼠疫的病人被孤立，有的家庭抛下得了鼠疫的亲人逃之夭夭……

萨拉特也运用疾病推动情节和人物关系的发展，这比起印度近代小说情节发展中经常出现的梦境、预言或巧合等更符合现实生活逻辑，表现出萨拉特现实主义小说艺术的成熟。作为《斯里甘特》的情节主线，斯里甘特与拉佳拉克什弥的关系发展与疾病有很大关系。每次两人因为社会习俗不得不分开后，疾病都会成为情感的催化剂，让他们再度相聚。因为拉佳拉克什弥的寡妇及歌女身份，斯里甘特囿于社会舆论离开她，四处流浪，病重奄奄一息之时，他被拉佳拉克什弥接走照顾，直至痊愈。斯里甘特在去缅甸的路上及在缅甸生活期间，目睹了被鼠疫折磨的人们，他因照顾一个鼠疫病人被传染，走投无路之时又是拉佳拉克什弥收留了他。之后，斯里甘特经常与疾病为伴，“我身体不好，总是生病”^③，而拉佳拉克什弥把照顾他视为自己的责任。萨拉特很好地运用了疾病促进人物关系发展，并在这一特殊的境况下，突出了拉佳拉克什弥的善良和忠诚。

疾病的日常性不仅表现在它经常伴随人物与情节出现，还表现在小说中大众对疾病的漠然和无奈。与般吉姆和泰戈尔在选择题材上都有所不同，萨拉特关注的是身处最底层社会的人们，如佃农、耍蛇者、歌女、流浪的苦行者等，他们的生活常与疾病为伴，没有条件获得必要的治疗和休养。在诸多痛苦的重压下，人们只能无视疾病，甚至视之为生活的常态。《旱季的乡村》中，发烧的高福得不到祭司、地主甚至村民的同情，只有年幼的女儿惦记着父亲还未吃饭。他们在面对病痛时，只有忍耐，只能希望珍贵的白米饭和清洁的水可以赶走病痛，身体稍

① 萨拉特·昌德拉·查特吉著，石真译：《斯里甘特（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5页。

② 同上，第98页。

③ 萨拉特·昌德拉·查特吉著，刘运智译：《甘特先生》，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372页。

有好转就必须投入工作之中。《嫁不出去的女儿》中，甘达的母亲卧病在床，来看望她的邻居没人问起她的身体状况，都在担心没有嫁妆的甘达如何出嫁。人们也并不关心甘达身体的病痛，只是遗憾长期发烧导致她瘦弱不堪，无法吸引前来相亲的人。

萨拉特所描述的疾病不仅仅是人们身体病态的反映，也具有等级差别的内涵。其小说中涉及的疾病种类，成为底层人社会地位的标识，与他们如影随形。穷人生活的地方卫生条件差，蚊虫跳蚤繁殖迅速，又缺少干净的水源，缺医少药，病原虫一旦传播就难以控制。因此，小说中写到的疟疾、鼠疫、霍乱这些流行病都与贫困有关，是底层人生活境况的符号。

萨拉特对疾病日常性的书写真实反映了20世纪初处于殖民统治下印度底层人的生活状态，他们贫病交加，苦熬时日，看不到希望，只能自生自灭，听天由命。在研究有关文学中的疾病叙事时，学者们经常引用苏珊·桑塔格的相关论述，但联系萨拉特笔下的印度现实，有些观点并不适用。如苏珊·桑塔格曾经描述现代工业社会人们对待癌症的态度，“对癌症患者撒谎，以及癌症患者自己撒谎，所有这些，都证明在发达工业社会里人们多么难以正视死亡”。^①而在萨拉特的小说里，疾病状态成为日常，人们都不必为之编造容易接受的谎言，疾病作为死亡的先锋在穷人的村庄漫游，人们已习惯与之共处。

二、个体病痛与社会痼疾

疾病对人的影响反映在个体的身体、心理层面，但文学作品不是病理报告，作家在描写人的疾病体验时，都会对疾病所反映出的社会文化状况进行反思，这在文学的疾病书写研究中已得到广泛的探讨。萨拉特有效地运用了疾病对个体的影响及其在社会关系构建中所起的作用，把个体的病痛与社会批判有机结合起来，更加客观而真实地剖析了印度传统社会的痼疾。

萨拉特对待印度传统的态度与般吉姆和泰戈尔有所不同，他没有像般吉姆那样出于确立民族认同的目的，对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进行民族主义的解释，也没有像泰戈尔那样在传统宗教中寻求精神家园，而是批判性地描述了印度社会存在的问题，呈现出印度传统对个体自由的束缚以及在精神上的压制。或许其作品的批判力度不够大，被学者们认为具有中产阶级的软弱性，但他对问题的揭示本身就具有批判性。他呈现出的社会问题包括种姓制度、印穆冲突、嫁妆制、萨蒂制等，这些社会积习与疾病一起压迫底层人，使他们深陷苦海。萨拉特很好地运用

^① 苏珊·桑塔格著，程巍译：《疾病的隐喻》，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1页。

了个体病痛所创造出来的叙事空间，突显了传统积习的冷酷和荒谬，也反映了底层人之间的情感世界。

种姓制度作为印度传统文化的产物，在英国殖民印度的过程中，其对个人生活、社群团结和民族认同的负面影响逐渐受到近代开明知识分子的批判。萨拉特在小说中通过生动感人的故事，展现了种姓制度在人与人之间制造的隔阂，通过病人的处境，凸显了这一不平等制度非人道的一面。《早季的乡村》中高福的身份是穆斯林，他生活在一个印度教村庄，被当作贱民看待。在村子里，高种姓控制着财富，也控制着自然资源。高福和高种姓的祭司、地主之间有着无形的不可僭越的高墙，当他病重之后向祭司行礼祈求帮助时，祭司吓得后退几步，生怕被高福接触到。高福和女儿阿密娜在贫困中艰难度日，生病之后连干净的水都很难喝上，因为地主的水井不允许贱民靠近：

这一向村里的两口大水池早干涸了。辛苦老爷家的池子还有水，但那是不给公用的。另外几口池子池底凿出来的水潭呢，存的水不多，抢着舀的人又是那么挤，像阿密娜这样一个回教女孩子，根本没法走近去。每次她总得在那儿守上几个钟头，幸而有人看她可怜，分给她多少水，她才能拿多少水回来。^①

萨拉特描写了种姓隔阂对人性的扭曲，长期被歧视的低种姓毫无尊严地活着，而高种姓则日益冷酷。高福贫病交加，祭司和地主对他没有半点仁爱和同情之心，只关注高福是否照顾好了他的母牛，并威胁高福不好好对待神牛就会受到惩罚。在他们眼中，高福的价值不如一头牛。但名义上他们敬拜神牛，实际上对待牛的行为却表现出他们的虚伪。高福病重无法割草喂牛，祭司和地主却不肯给牛施舍一把稻草，而高福忍着高烧和饥饿，可以把自己的口粮留给牛吃，甚至会瞒着女儿偷偷地扯下棚顶的干草喂牛；饥饿的牛挣脱缰绳，跑到地主家的花园里吃草，却被拖住扣留，高福情愿借钱也要赎回它，而祭司和地主考虑的只是如何惩罚高福。一头牛的遭遇折射出高种姓的虚伪冷酷和底层穷人的善良淳朴。高福是穆斯林，并不崇拜神牛，但因为他与牛长期共同劳动，对牛有着真挚的情感。他给牛起名摩黑什，表现出对这头牛的喜悦，因为在孟加拉语中“摩黑什”意为“阿姨”“大娘”，是对中年女性的称呼；他并非视牛为神，而是把它当作生活中的朋友。他抚摸着老牛喃喃低语，对它诉说自己的愧疚和不舍，感人至深。小说最后，因为摩黑什撞翻了阿密娜的水罐，高福一气之下杀了它。为了避免被印

^① S.C.查太基著，思默译：《早季的乡村》，《风下》，1948年第126期，第15页。

度教徒惩罚，高福连夜和女儿逃离了村庄。小说通过高福父女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批判了高种姓地主和祭司对他们的物质剥削和精神压迫。压迫之重，已经远远超出高福所能承受的范围，他的生活就是在死亡线上挣扎。疾病没有剥夺他的生命，但是宗教和种姓偏见却使他无处存身。小说中的情节并非耸人听闻，印度现实主义小说家普列姆昌德在《地主的水井》中也描述了类似的题材。

萨拉特最有名的中篇小说《戴夫达斯》（*Devdas*, 1917年）更生动地展示了种姓制度对个体的伤害。戴夫达斯与帕罗的爱情因两家种姓不同遭到压制，戴夫达斯无力抵抗父亲的权威，开始了灯红酒绿的堕落生活，最终恶疾缠身，不治身亡。小说的英译者指出：“戴夫达斯的消极并不指向虚无主义。戴夫达斯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他存在着，他以真正存在主义者的方式，只是通过存在做出了声明，那就是被不能实现的爱击中的人生所呈现出的异常、冷酷和漫无目的。这是小说的成功所在。”^①戴夫达斯的病看似爱情病，但他和帕罗却一直深爱着对方，爱情无法实现的根本原因是种姓制度。戴夫达斯的病痛来自爱情的无法实现，更是父亲的权威和传统观念的压迫所致。他放弃正常的生活，用酒精麻醉自己，毁掉身体的健康，像啼血的杜鹃，用尽生命最后一息诉说哀怨和不满。

近代印度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女性的命运受到空前的关注，社会改革家开始审视传统中的童婚制、嫁妆制和萨蒂制等根深蒂固的习俗对女性的戕害，作家也开始在感人的故事和全新的女性形象中思考女性问题。般吉姆、泰戈尔莫不如此。与他们相比，萨拉特更强调底层女性光辉的品格，对传统积习的批判也更彻底。这方面已得到文学史家的公认：“萨拉特在推进女性解放方面的热情，毫不逊色于社会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②

对嫁妆制的批判集中反映在小说《嫁不出去的女儿》中。这部作品围绕没有嫁妆的甘达展开，通过这个花季少女的悲惨遭遇警醒世人，刺痛读者的心。甘达一直被疟疾带来的发烧所折磨，却不敢告诉母亲，因为比起她的病痛，更让母亲焦虑的事情是因为没有嫁妆无人娶她。与疟疾带来的高烧相比，村民及家人的羞辱和责骂更让甘达难以承受。伯母刻薄的语言如同刀子，甚至到最后母亲对她也失去了爱意，开始责骂她，“贱骨头！看见你的脸我全身都像火烧”^③，母亲甚至诅咒她死。传统嫁妆制导致失去父亲、没有嫁妆的甘达无人问津，她似乎成为罪恶的化身，成为家人的眼中钉。作家细致地描绘了这一传统观念对人性的扭曲，人与人的关系因之变得冷漠，家庭生活如同地狱。“大家只不断地对她加

^① Saratchandra Chattopadhyay. Sreejata Guha trans.: *Devdas*, New Delhi: Penguin Books India, 2002.p.xi.

^② Nalini Natarajan ed. *Handbook of Twentieth-Century Literature of India*,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96. p.49.

^③ 萨拉特·钱达·查特吉著，石真译：《嫁不出去的女儿》，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第53页。

以羞辱责骂，却没有一个人想一点办法来帮助她。”^①小说中唯一一点人性的闪光，是写到甘达的舅妈知道她发烧之后，熬了药给甘达吃，并阻止了自己的丈夫想用甘达偿还债务的卑鄙行动。但这微弱的光亮不足以照亮甘达的人生，病痛的甘达似乎只有死路一条。疾病只是让她身体不适，而社会的病态却可以剥夺她生存的权利。甘达的心理活动充分说明了落后的嫁妆制习俗对人精神的迫害：

天啊！我得罪了谁？大家都把我当作眼中钉。我不漂亮，我没有首饰、衣服，我没有爸爸，这难道是我的罪过？我的病成一把骨头的身体，我的无血色的瘦脸吸引不了任何人，这难道是我的过错？谁也不管我结婚的事，可是我的年纪一天天大起来了——这难道也是我的罪恶？神啊！如果这些都是我的过错，那么把我送到爸爸那里去吧，他永远不会抛弃我。^②

疾病伴随着甘达和母亲，而传统观念形成的习俗力量对她们构成了更大的威胁。甘达经常想到死亡，只是为了照顾母亲才放弃寻死。而母亲拖着病体却还一直忧虑女儿的婚事，她卧病在床，身体日益虚弱，只有听说相亲者来到，才能打起精神。她一边为女儿的婚事发愁，一边忍受着疾病的折磨，直至死去。作者通过描写疾病以及村民对病人的态度，生动地呈现出甘达母女所经历的痛苦，强化了社会的冷酷。

疾病创造出一个新的空间，使作者得以展示日常状态下被掩盖的社会禁忌。萨拉特将个体病痛置于社会网络中进行描写，更突出了社会痼疾之危害，启发读者去思考疗治之道。个体病痛在医学发展的条件下容易治愈，而治疗社会痼疾并非易事。因此，萨拉特并没有给主人公安排光明的结局，他用一个个人生悲剧揭开了笼罩社会的幕布，显示出其背后的黑暗与落后，通过个体的病痛经验，开启对社会痼疾的批判，同时展现了对新秩序的向往。

三、无力行动的主体与殖民地现实

萨拉特小说中的疾病书写在展示社会痼疾、突出底层痛苦的同时，并没有提供解决的途径。小说中的主人公往往表现为“反英雄”的特点，他们脆弱不堪、犹疑不决、缺乏勇气、逃避生活，无力承担改变社会的使命，同时内心又感到空虚和痛苦。这一特征在《嫁不出去的女儿》中的阿杜尔、《秘密组织——道路社》中的阿布尔沃、《光与影》中的叶盖德特等主人公身上都有所体现。

^① 萨拉特·钱达·查特吉著，石真译：《嫁不出去的女儿》，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第45页。

^② 同上，第53页。

这一现象已有研究者从社会阶级的角度进行了阐释，例如，石真在《斯里甘特》的译者序中写道：

他的保守思想，使他对触犯现存的社会制度、风俗习惯持审慎态度。因此在他的小说里，往往只写出生活的矛盾和冷酷，只写出男女主人翁背负着社会习俗的枷锁在痛苦、呻吟、憔悴，却没有进一步指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萨拉特出身于贫困的中产阶级，又深受婆罗门家庭正统印度教思想影响。中产阶级的妥协性，传统思想意识的顽固性，注定他要在印度社会新旧势力斗争中徘徊于进步与保守之间，不敢断然表态。^①

倪培耕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

萨拉特的世界观不仅具有中小资产阶级的固有特性——摇摆性和软弱性，而且带有印度的这个阶层特有的封建传统观念，无怪乎萨拉特所塑造的比较成功的艺术形象大多是些徘徊惶惑的、多愁善感的软弱人物。^②

上述学者多是从作者所属的阶级出发，阐释萨拉特作品中人物的特征。从文本独立的丰富世界来看，我们会发现作者巧妙地运用疾病的隐喻，塑造了被剥夺了主体地位的印度人形象，让读者看到主人公的脆弱无能与殖民地的现实有直接关系，从而委婉地批判了殖民主义。萨拉特最优秀的作品《斯里甘特》在这方面具有典型性。

《斯里甘特》中大量的笔墨在描写印度农村破败凋敝、民众被疾病所苦的现实。广大的农村“没有水，没有生命，没有健康，到处是肮脏的垃圾，既不见阳光，又不通空气。没有知识，没有学问”。^③这种状况并不是某一个印度人的病态，而是整个印度农村的病态。斯里甘特在各地看到的悲惨现实让他对整个民族的境遇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我开始想，不到这些村庄来，就永远看不到自己家乡的价值。我们的水里有浮萍，空气中有疟疾，人们肚子里有蛔虫，家家有矛盾，村村有纠纷，可是其中有多少韵味、多少欢乐，现在我好像全都清楚了。”^④苦难让他体会到这些不同村庄背后类似的命运，个体的病痛与整个国家

^① 萨拉特·昌德拉·查特吉著，石真译：《斯里甘特（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页。

^② 倪培耕：《萨拉特·钱德拉·查特吉——试写〈印度文学史〉一章》，《印度文学研究集刊》第一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263页。

^③ 萨拉特·昌德拉·查特吉著，刘运智译：《甘特先生》，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246页。

^④ 同上，第94页。

的病态逐渐连成一体。不断肆虐的疾病侵蚀着印度人，如同外来的种族剥削着印度。作者虽然没有塑造具体的英国殖民者的形象，但却通过人物对话及斯里甘特的自述明确了殖民主义的背景：

在印度建立了外国人的统治制度，因此，在印度没完没了地到处扩展铁路。在贸易的名义下，富豪努力地不断扩大自己的金库，弱者的幸福消失了，和平消失了，粮食没有了，道德沦丧了，活路一天天变得狭窄了，没完没了的负担更难以忍受了。^①……他们在全世界积集的罪恶遮盖了一切幸福。先生，这铁路、火车、工厂，这些神圣的既得利益者，压得世上穷人连出气的地方都没有了。^②

小说以铁路、火车、工厂这些在殖民地印度兴起的现代事物象征英国在印度的影响，英国没有以某个具体人物形象出现，而是作为无形的存在，影响着印度人的生活。在底层民众痛苦生活的描述中，殖民者是不在场的，他们似乎与此无关，似乎也不是他们直接造成了民众的苦难。然而，四处延展的铁路与民众的痛苦形成了对比，说明殖民政府只追求利益而置民众的死活于不顾，在政治、经济舞台上的在场与底层生活中的缺席正好证明了英国殖民者在印度的掠夺者本质。

在殖民主义的现实下，印度知识分子在东方和西方、传统和现代、宗教与科学间寻找着前进的道路，但他们的努力并不能撼动强大的殖民统治。在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过程中，反映印度资产阶级利益的国大党在很长时间内无法左右殖民政府，暴力斗争的道路最终也失败了，甘地领导的非暴力运动最终带领印度走向独立。历史说明了印度反殖民主义斗争方式的独特性。印度并不是通过武装革命实现了民族的独立，而是通过“无行动”的行动实现了目标。从这一点来看，缺乏行动能力的斯里甘特不仅仅是萨拉特个人思想的具体化，也反映了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印度知识分子的命运和生存状态。他目睹了宗教和科学对于民众的影响，但最终却不做选择，避居一隅。

斯里甘特作为叙述者主人公，他的形象是逐步形成的。作者运用第一人称自传式的叙事视角，斯里甘特既是叙述者，又是小说中的人物。这一叙事方式使作品具有了个人反思和社会批判的双重视角，“通过将叙事朝内指向自身，作家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去呈现某一具有典型意义的中心人物，而通过将叙事朝外指向现实，作家则几乎不可避免地去针砭时弊。可以说，第一人称叙事乃是思想观念的

^① 萨拉特·昌德拉·查特吉著，刘运智译：《甘特先生》，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314页。

^② 同上，第315页。

积极载体”。^①斯里甘特在流浪的过程中看到了遭受苦难的人们，对他们充满同情，对社会陋习多有不满，他个人也由善良、真诚、乐于助人逐渐发展为消极被动的近似虚无主义者的形象。

幼时的斯里甘特表现出追求自由和乐于助人的品质。他和英迪拉一起去冒险；接触耍蛇人夫妇；为安娜达姐姐对爱情的赤诚和遭遇而感动；掩埋病死的婆罗门女人的尸体；为英迪拉表哥的颐指气使愤懑异常；在去缅甸的路上，帮助得病的罗希尼；到了缅甸之后，帮助奥帕亚寻找丈夫；得知这个男人在缅甸已娶妻生子之后，尽自己的力量对他进行惩罚；冒着被传染的危险照顾身患鼠疫的莫诺赫尔；回国之后在村子里照顾得了霍乱的村民……但其主动选择、参与的精神是逐步弱化的。在去缅甸的船上，斯里甘特之所以帮助罗希尼，是因为奥帕亚主动寻求他的帮助，甚至可以说是“要求”；患了鼠疫的莫诺赫尔也是在斯里甘特路过时喊他上楼，而仆人担心被鼠疫传染逃走了，斯里甘特不得不留下来照顾他，斯里甘特认为这是人生中的“定数”；回国之后，在拉佳拉克什弥的照料下，斯里甘特逐渐痊愈，他是在拉佳拉克什弥的安排下不断更换生活地点，自作主张回到故乡的村庄，还差点接受母亲在世时定下的婚约，写信给拉佳拉克什弥征求意见，才决心摆脱这段婚姻。随着情节发展，斯里甘特被动的特征逐渐明显，他内心最想做的事情是离开生活常轨，外出流浪。他对于改变现状表现得日益淡漠，即使对于个人生活，如对于拉佳拉克什弥的爱情，都采取回避的态度。

萨拉特充分利用了疾病来塑造斯里甘特形象的变化。因为生病，他无法积极参与到现实生活中，然而这种病恹恹的姿态不仅仅是肉体的表现，也是精神状态的隐喻：

只有我提不起劲。也许是因为我的脾气或是无形的东西遮掩了我富有的生命力。幸好对我的消极谁都不觉得奇怪，好像对我期望什么都是不现实的。我孱弱、有病，有时在场，有时不在场。可是我没有任何病，能吃能睡。^②

这段自述很好地说明了斯里甘特的病状在外人看来是身体上的，实际上是精神层面的。他缺乏主动作为的动力，只能以置身事外的态度旁观。而在他人眼里的病状正好使其得以掩饰行动的缺乏。

^① 罗伯特·斯科尔斯、詹姆斯·费伦、罗伯特·凯洛洛著，于雷译：《叙事的本质》，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0页。

^② 萨拉特·昌德拉·查特吉著，刘运智译：《甘特先生》，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487页。

我有时是以读书度日，有时是把自己往昔的故事写在本子上，有时独自在空地上走来走去。有一点是肯定的，工作的热情我没有，作战、掠夺、在人世间骑在人们脖子上的本事我没有，我也不想有。我认为，得到这些就足够了。房产、钱款、财富、名誉这些东西，只是过眼云烟。别人来看望，我虽然有时在责任的驱使下赶走了自己的懒惰，但多数时候我又闭上了眼睛，人家推一百下，我也不想动一下。^①

因为有病，斯里甘特得到拉佳拉克什弥无微不至的照顾，并且获得了无所事事的特权。“醒过来后睁开眼睛，看到坐在床头的是她。当时我抛开一切念头闭眼睡了。责任是她的，不是我的。”^②他在病中轻而易举且合理地放弃了自己的责任，放弃了自己的主体性。

显然，斯里甘特的疾病不仅仅是身体的不适，萨拉特其内心活动的描摹向读者勾勒出他真正的病因：

我从小起就没有什么生活目标，也不知道硬要祈求什么，幸福、痛苦的思想也与我无缘。而这一向只是在别人的照看下，按别人的信念和命令行事度日。所以任何工作都不是由我来完成的。优柔寡断，下不了决心，一切努力都半途而废。^③

斯里甘特缺乏生活目标，没有主动选择的能力，一切按照外力的作用向前。这暗合了殖民地印度的形象，让读者联想到失去国家主权的印度在外族统治下的虚弱。萨拉特在小说中很少直接跳出叙述过程向读者传达某种道德立场或思想观念，而是让人物说话。“他的叙述是人物性格驱动的，但这些人物的性格并不是被说明出来；作者允许他们在故事形成的过程中发展，并向读者显示自己。”^④斯里甘特虽然没有明确地将个人与民族联系起来，但这一艺术形象本身向读者展示了他与印度的隐喻关系。

斯里甘特对宗教的看法也表现出他对印度发展的忧虑和对传统印度的否定性看法。斯里甘特追求自由，念念不忘流浪生活，似乎在实践印度教的遁世传统。拉佳拉克什弥评价他：“你对世界上的任何东西都不贪恋，也就是说，不需要。”^⑤这表现出他类似清心寡欲的出家人的形象。小说中也几次写到他 and 苦行

① 萨拉特·昌德拉·查特吉著，刘运智译：《甘特先生》，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488页。

② 同上，第428页。

③ 同上，第427页。

④ Saratchandra Chattopadhyay. Sreejata Guha trans.: Devdas, New Delhi: Penguin Books India, 2002, p.vii.

⑤ 萨拉特·昌德拉·查特吉著，刘运智译：《甘特先生》，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444页。

者、瑜伽师在一起。但这种古老的宗教追求并没有满足他的内心，没有去除他的空虚，反而暴露出他的虚伪和无力改变现实的尴尬处境。

斯里甘特追随过一个苦行者一段时间，由此了解了苦行者的生活以及印度民众对这一特殊群体一如既往的敬重。但是苦行者的生活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清心寡欲：

为了斩断尘缘和艰苦修行，师父对于每天的供养有一套颇为严格的规定。量要多，味要美。茶、烙饼、酥油、酸奶、牛奶、炒米和糖等等是每日三餐必备的“简单的”饮食，当然饭后还有助消化的东西。而我们呢，为了把身心敬献给薄伽梵莲花座前不致烦恼丛生，在这方面也十分注意，从来不敢丝毫轻慢。结果，枯木开花——我瘦骨嶙峋的躯体，日渐丰腴，肚子圆滚滚，颇有呈现罐状的趋势。^①

作者对这个苦行者的讽刺是显而易见的。作为宣扬“斩断尘缘”的出家人，这个“师尊”却抽大麻，喝酒，心安理得地享受弟子的奉献和村民的供奉。人们敬重他，但当瘟疫来临，他并不能拯救民众。当他们在一个村庄化缘时，正赶上村子里流行瘟疫，“丰富的供养源源不断地送进了我们的帐篷，换回去的是我们祭火中的一小撮神圣的灰烬，和师父水罐中的几滴圣水。在这灾难临头的时刻，村民们谁也不肯怠慢出家人”。^②瘟疫流行起来，师父就离开了这个村子，只有斯里甘特不忍心让村民罗姆失望，选择留了下来。这一事件让斯里甘特认识到，出家人并不能拯救民众的病苦，他们只是利用民众的宗教热情满足生存需要。

斯里甘特也曾进入一个静修所和毗湿奴的信徒们在一起，这一情节更彻底地表达了作家对宗教道路的质疑和否定。那里大多是寡妇或在现实中无处藏身的人，他们每天敬神诵经，村庄里的人们也虔诚地献给他们生活的必需品，他们跪拜在烟雾、鲜花和供品围绕的神像前，听着圣歌，个个眼含热泪，似乎进入了一个远离世俗的理想境界。“对于感情的这种迷误，我感到害怕，急忙走了出来。”^③斯里甘特的理性让他无法沉迷其中，他对这些毗湿奴的信徒们把自己完全交给神的行为产生了反思：“这是什么儿戏？断绝了同外界的联系，迷恋于这几个无生命的偶像。人怎么能在这么大的自我欺骗中活下去？”^④斯里甘特的内心活动突出了他理性主义的思考，进一步否定了宗教救世的可能性。作者通过讲

① 萨拉特·昌德拉·查特吉著，石真译：《斯里甘特（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30页。

② 萨拉特·昌德拉·查特吉著，刘运智译：《甘特先生》，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138页。

③ 同上，第391页。

④ 同上，第418页。

述科莫尔洛达和戈哈尔的爱情故事，揭穿了静修林的伪善。斯里甘特的好友戈哈尔爱上了静修林的科莫尔洛达，但他们极力克制，压抑情感。戈哈尔染病之后，科莫尔洛达才打破禁忌去陪伴他度过最后的日子，而教派的师父认为科莫尔洛达已被污染，把她驱逐出了静修所。这一事件让读者意识到那些信徒每日的“神圣”生活的虚伪性，信仰并没有使他们解脱，只是帮助他们压抑个体的生命而已。而社会习俗与人们陈旧的观念弥漫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即使在远离尘嚣的静修所，也难以逃脱世俗律令的惩罚。

从这些对苦行者和宗教人士的描写可以看出，萨拉特与般吉姆、泰戈尔的认识有很大不同。在般吉姆的作品中，苦行者是高尚的拥有神秘力量的人，他们可以拯救苦难者，甚至可以拯救民族和国家。泰戈尔对传统宗教信仰及“梵我合一”更是寄予厚望。而萨拉特呈现出的是出家人的虚伪和脆弱，他们不再是理想人物，不仅不能改变现实，还成为具有寄生性的存在。唯一正面的苦行者阿难陀，带着药箱走街串巷，但他知道：“我们不是治霍乱的料……只试着给药，但这也是需要的，也是大神薄伽梵的命令。”^①其疗治的效果可想而知。

在疾病面前，宗教拯救的道路是走不通的，与之相对的另一端便是科学的道路。对于民众的疾病，医生可以起到拯救的作用。但代表科学精神的医生在萨拉特的小说中并没有扮演重要的角色。医生在小说中第一次出现扮演了拯救斯里甘特的形象。少年斯里甘特与英迪拉一起埋葬了一位被教族认为是贱民的婆罗门女人，他们这一充满人道主义的行为却被顽固的教族势力认为是肮脏的，“他们决定要严厉惩罚这些胆敢违背圣典规定、为一个不可接触的人举行火葬、有辱婆罗门神圣清白的罪人。这些人必须剃光头发；必须当众认罪；并且一定要吃一种东西，这东西虽然被认为十分圣洁，却绝对不是可以下咽的食物（指牛粪）”。^②斯里甘特和英迪拉去找了英国医生，英国医生表示，如果那些婆罗门要惩罚他们，他将不再给这些人们治病。在英国医生的严词震慑下，婆罗门收回了对斯里甘特的惩罚。作者感慨道：“只有创世主知道，经过医生巴布那天的一次大手术，他们引经据典、囿于成见的痼疾是否能够霍然痊愈？”^③作者在描写英国医生与印度婆罗门的关系时，明显运用了比喻的修辞，顽固的坚守传统的婆罗门被认为痼疾缠身，医生对他们的阻止被比喻为“大手术”。

除了这个与上层社会交往的英国医生之外，斯里甘特在底层民众中很少看到医生的身影。底层民众与医生之间存在巨大鸿沟。比起医生，他们更愿意相信苦

^① 萨拉特·昌德拉·查特吉著，刘运智译：《甘特先生》，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245页。

^② 萨拉特·昌德拉·查特吉著，石真译：《斯里甘特（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3页。

^③ 同上，第34页。

行者。医生在民众眼中还是新鲜的角色，而去医院在有些人眼里也是危险的事：“人们上医院去，得吃别人碰过的东西，你说，那不就失去种姓了吗？”^①在小说中，医生远离农村，得病的村民根本见不到他们；因为穷困，人们也没有条件请医生。现代科学并没有深入印度社会，更无法拯救民众于水火之中。

在殖民主义的背景下，宗教道路和科学道路都无法解决民众疾苦，就像印度民族独立运动时期激进派领袖提拉克指出的，“只有一种药能治印度人民的病，这就是政权。它应该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②印度反殖民斗争的失败使萨拉特对现实表现出深深的失望甚至绝望。反映在人物身上，就是斯里甘特经常病重躺倒，逐渐丧失了行动的能力，无力反抗现实。他是个人化的角色，也是所有印度人的象征，他的病弱隐喻着在被外族统治的境遇中，印度丧失了自己的主体地位。就像詹明信所提出的，“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③萨拉特通过具有现实背景的疾病，巧妙而生动地塑造了一个具有象征性的形象。他的病状，不仅是个体的身体经验，更是一个民族精神状态的隐喻。

四、结语

萨拉特描写了被鼠疫、疟疾、霍乱等疾病折磨的印度人的生活，突出了疾病的日常性及残酷性。疾病使人逼近死亡，也在人们之间增加了新的隔膜，个体疾病凸显了社会的痼疾。人们在贫病交加中的沉默与无力，既是现实生活的再现，也是被剥夺了主体地位的殖民地的象征。萨拉特巧妙地运用疾病意象，既反映了20世纪初印度传染病高发的现实及民众的苦难，又通过隐喻的方式暗示了印度社会的痼疾，批判了英国殖民统治对印度的剥夺和戕害。特定的历史语境决定了印度疾病的无法治愈，主人公只能在病痛中等待新生的曙光。

[责任编辑：李丽]

① 萨拉特·昌德拉·查特吉著，刘运智译：《甘特先生》，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327页。

② 林承节：《印度近现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27页。

③ 詹明信著，张京媛译：《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陈清桥等译：《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23页。